

兵家必爭的壽春

——歷史形象的形成與轉變**

孔 爲 廉*

摘 要

壽春（今壽縣）的歷史既長又豐富。從春秋時期起壽春位於肥水入淮河之口，戰國末是楚國最後的國都。西漢時代它是淮南國首都，其四位國王之內有三位反叛皇帝，包括最後之王劉安。漢朝時期經濟逐漸發展，淮南成為產糧重地，而壽春成為南北間的貿易樞紐。在東漢落入軍閥爭權形成三國鼎立，壽春戰略地位益增。三國、六朝時代壽春是多次重要戰爭的戰場，包括 383 年最有名的肥水之戰。肥水之戰被視為中華文化能免於北方戎狄蹂躪的關鍵。儘管經歷多次戰爭，壽春仍然是南北間活躍的商業和宗教交換中心。隨著唐朝統一中國，壽春的重要性雖降低了，但到南宋又恢復以前的關鍵性地位。南宋官員常以壽春在六朝時期的重要戰略地位為例，堅持以淮河為抵抗金族的戰線。抗戰時期愛國的歷史家也常援引六朝壽春的歷史，尤其是肥水之戰為例。

關鍵詞：壽春、六朝、淮南、淮河、肥水之戰

2010 年 11 月 9 日收稿，2012 年 2 月 3 日修訂完成，2012 年 2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 William Gordon Crowell 曾任美國奧勒岡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現為獨立學者。

** 我對壽春的研究始於 1980 年因中國大陸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擔任南京大學訪問學人，到壽縣的一次旅行。我要感謝南京大學外事辦公室和章榮春先生、南大歷史系陪同我前往的孫述圻、壽縣革命委員會、壽縣博物館和壽縣水利局的各位領導。我也要向已故的孫劍鳴、中研院史語所的邢義田和澳州國立大學 Rafe de Crespigny 教授的指教表示謝意。此外，壽縣博物館館長許建強和奧勒岡大學圖書館的 Robert Felsing 博士的協助也令我十分感謝。本文有一部分研究是 2006 年我在中研院史語所擔任訪問學人的兩個月期間完成的，感謝史語所提供的機會和研究資源。唯本文如有任何錯誤，皆由作者自行負責。

一、前 言

自西元三世紀初漢朝式微，到西元六世紀末隋朝興起，中國土崩瓦解為大大小小的國家和獨立勢力。這段時期帶來的苦難和亂世之感，使不少學者將這段時期視為中國文化飽受威脅的時代。他們在略表三國英雄，簡述佛教傳入和「自然經濟」的出現、崇尚自然的士大夫和亂華的五胡之後，即將幾百年的歷史匆匆帶過。現在的學者則力圖揭去表層，深入發掘這個時代思想豐富、政治活潑和社會活力的一面，重新塑造這段歷史，以便將它重新拼入中國史的大畫卷。

本文試圖重建壽春在一個大分裂時代中的歷史，特別是壽春所在的淮水流域在南北朝時期具有的戰略意義和歷史上相關的議論。這些議論，對後世——不論是宋代的史家和決策者，甚至當今的學者或壽縣的居民——因不同的理由，都各有重要的意義。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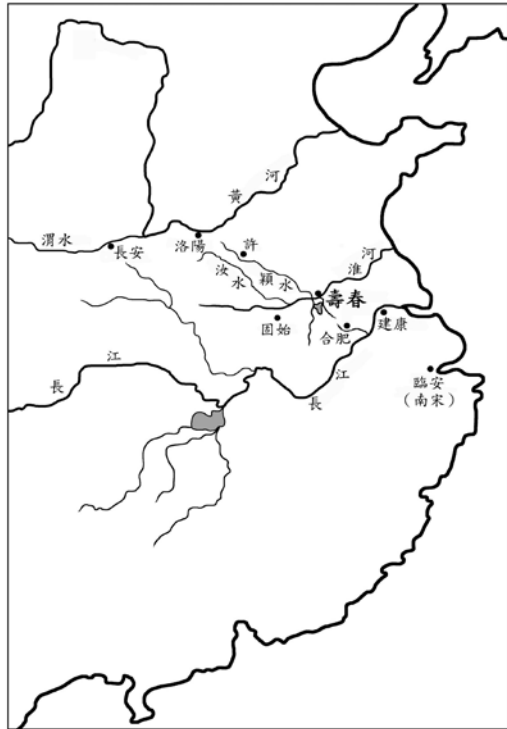
南北朝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傳統中國的疆域大致以淮水為界，分為南北。所謂以淮水為界，包括淮水南北兩岸的流域。此地為兵家所必爭，戰亂不歇，其歷史和發展因而深深受到影響。冀朝鼎在他開創性的中國經濟關鍵區（key economic areas）的研究中，指出中國四大東西向水系（黃河、淮水、長江、珠江）中，僅有淮水一帶不被認為是經濟關鍵區，它反而被認為是黃河和長江兩大經濟區域的邊緣。他認為淮水儘管被形容成自然資源豐富，但是它在歷史上「四戰之地」的角色卻剝奪了它成為「經濟關鍵區」的可能。²

淮水一帶除了作為黃河和長江兩大經濟區的中界，恰恰也是中國氣候、

-
- 1 在本論文討論的時代範圍內，壽春在東晉時因避簡文帝鄭太后之諱，曾短期更名為壽陽。隋以後名為壽州，壽春變成壽州之下的縣名。文獻中壽春、壽陽、壽州三名常不分先後混用。唐代開始，此地有時名為安豐，芍陂被稱為安豐塘。壽春目前名為壽縣。壽春有時既指其城，也意指其周邊，包括芍陂和八公山。本文原則上遵用原來文獻或個別徵引中所使用的名稱。因為它們使用這些名稱，應各有其理由。
 - 2 Chi Ch'ao-ting,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1936; reprint,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3), pp. 104-107.

雨量分布、地形和農作物的分界線。³淮水兩岸雖然大部分都是平原，南岸的湖泊和溪流遠比北岸多，南岸作物以水稻爲主，北岸則多小米和小麥。⁴淮水在古代也可以說是文化的分界。在先秦時代，淮南以吳、楚文化爲主，其後的漢文化亦以淮爲界，南北有異；南北朝以降淮水以南的中國人（包括北方南下的移民和南方土著）力圖以南方爲「中國文化」的根據地，對抗入侵北方的胡人。⁵

在戰略上，居於這樣分界地帶的城市就是壽春。壽春處在淮水與北流的肥水和淠水，南流的



圖一 壽春的地理位置（陳美月繪）

-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18, fig. 861.
- 4 Francesca Bray and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2,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1, 22-27, 286, 423-424; Cho-yun Hsu, *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2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 pp. 86-87, 99-100.
- 5 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認爲「楚文明」和「周文明」就政治和禮儀層面而言，並沒有太明顯的差別，但他不否認有民間文化的差異。參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25. 即便如此，漢代和漢代以後，文獻中都指出淮南和中原民風與習俗有別。西元一世紀的班固曾指出吳楚不同的文化到他的時代仍持續可辨。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8 下〈地理志〉，頁 1666-1667。

汝水和潁水交會處的附近。它充分體現了淮南在南北之間的樞紐地位。壽春不但是主要貿易路線的樞紐，也因居於路線的樞紐而成兵家必爭之地。

二、壽春的早期歷史

在進入南北朝之前，壽春已有極長的歷史。在秦興起以前，壽春一帶已經是中原和南方之間政治與文化上的邊界，弔詭的是它同時也是四方衝突和避難之地。這個地區原為春秋時的蔡國，政治和文化上屬於中原華夏，長期受到楚、吳「非中原」之國的威脅。西元前 457 年，楚滅蔡，蔡國從此消失。西元前 243 年，楚考烈王為避秦的威脅，遷都此地，更名為郢。郢都之稱和先前四個楚都之名相同。楚國最後四位君王即以此為都，直到西元前 223 年為秦所滅。⁶

秦亡，群雄逐鹿，壽春始終在主要戰場的邊緣。楚漢之爭時，淮水的糧產可能曾供應滎陽的敖倉，⁷但我們無法肯定壽春及附近這時已成為重要的穀倉。西元前 202 年，楚漢相峙，劉邦遣其侄劉賈攻破壽春，勸項羽將周殷歸降於漢。他們在九江招兵，聯黥布之師，移往垓下。在此，大敗項羽。⁸劉邦建業，壽春從此進入了一個不安和叛亂的歷史新階段。黥布因擊敗項羽，被封為淮南王。⁹他可能在被迫保命的情況下隨即叛變（他被其妾暗誣陰懷不

6 陳懷荃，〈州來，豫章和壽春城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2: 189-200；陳夢家，〈編輯後記〉，載安徽省博物館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考古學專刊》乙種第 5 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 19-21；Xueqin Li, *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 trans. by K. C. Ch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4-185; Cho-yun Hsu,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p. 556.

7 Michael Loewe, "The Founding of the Dynasty," in Michael Loew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2.

8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51〈荆燕世家〉，頁 1994；卷 90〈彭越列傳〉，頁 2593；卷 91〈黥布列傳〉，頁 2602-2603；Michael Loew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 Xin Periods (221 BC-AD 24)* (Leiden: Brill, 2000), pp. 315-316, 447-448.

9 《史記》，卷 91〈黥布列傳〉，頁 2599-2603。

北，大部分在南的兩部分，仍是其父劉長和黥布王國的具體而微。

劉安自以爲應繼帝位，承大統，一直期盼有入繼大位的機會。他在壽春召納四方遊士，著書立言，編成《淮南子》，於西元前 139 年進呈武帝。如賈誼所料，劉安果然謀反，雖然他不一定是爲反武帝，也不一定出於賈誼所假想的理由。劉安或許覺得他遭受不平，陰謀起事，也可能僅是利用形勢，煽起久已煙消的餘燼而已。西元前 122 年，亂謀敗露，劉安自殺。¹⁵ 壽春於是在不到一百年中成爲淮南三王一次起兵，兩次謀反的基地。不消說，王國從此消滅，壽春變成九江郡治。¹⁶ 但是淮南一帶，此後經三國到近世，都背上了桀驁不馴，好爲奸亂的惡名。¹⁷

15 《史記》，卷 118〈淮南列傳〉，頁 3082-3094；《漢書》，卷 44〈淮南王〉，頁 2145-2157；Benjamin E. Wallacker, "Liu An, Second King of Huai-nan (180?-122 B.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2.1 (Jan.-Mar., 1972): 36-51; Michael Loew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pp. 271-272.

16 劉安不是淮南國最後一位國王。王莽敗亡後，莽所命廬江郡連率李憲在西元 23 年稱淮南王。四年後，他稱帝，置百官。第二年，光武帝抵壽春，派軍攻李憲，憲逃，被手下之兵所捕殺。參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1 上〈光武帝紀〉，頁 16、35；卷 1 下〈光武帝紀〉，頁 48；卷 12〈李憲列傳〉，頁 500-501；卷 22〈馬成列傳〉，頁 778、780。

17 司馬遷說淮南之人「其俗剽輕，易發怒」。見《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67-3268。班固則說此地舊屬吳、粵，「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見《漢書》，卷 28 下〈地理志第八下〉，頁 1667。東晉伏滔則更指出此地之人「善變好戰」，「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見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92〈伏滔列傳〉，頁 2400。可能成書於唐代的《壽州圖經》則謂「其俗尚武稍文辭」。（清·曾道唯等編，《光緒壽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1，影印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卷 3，頁 7 上引）章潢（1527-1608）說鳳陽府（指較壽春廣濶的區域）的風俗尚勇力，勤耕作。見明·章潢，《圖書編》（《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36，頁 7 下。清代乾隆時期《霍邱縣志》也說霍邱一帶的百姓頑強難治，蓋因此地古來爲戰場也。見清·張海等編，《霍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影印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本），卷 2，頁 22 上。到晚清和二十世紀初，這一帶是盜匪和叛亂的淵藪。參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0-11, 110-111, 127. Perry 教授討論的重點雖然是淮北地區，但淮南情況其實相似，她還特別提到了壽春。

三、壽春之城

在進一步討論壽春的戰略和經濟地位之前，這裡打算先對南北朝時代壽春城本身作一簡單的描述，使我們對壽春城內外的建置、人口和生活面目有一基本的認識。

約西元前一百年，司馬遷或曾遊訪壽春，稱壽春為「一都會」。¹⁸ 其時，如前所述，壽春早已是三位楚王和四位淮南王的國都。可是漢代壽春城的大小和周遭環境如何，幾無可考。¹⁹ 到東漢末和三國時期，因為壽春的戰略地位變得重要起來，我們才稍知其一二。壽春城在沒有戰亂威脅的時期，是貿易的樞紐，也是揚州（後來的豫州）的州治，因對抗曹魏，流民湧入，享有過繁華興盛的日子。西元 255 年，人口據說超過十萬。²⁰ 這個數字並非準確，可是仍多少反映了此地的盛況。在整個南北朝時期，壽春曾因時而戰亂，時而安定，人口增減起伏不定。²¹ 北方流民的湧入和「僑」居制度的創立也影響了人口的波動和交融。²² 由於南北人口匯集，壽春必然曾經生機蓬勃。

從西元五世紀下半期，壽春城和周邊的面貌因有酈道元（？-529）《水經注》和王玄謨（388-486）《壽陽記》的殘文可據而變得較為清晰。壽春城有城門：石梁門為北門，芍陂門為南門。西有三門：象門、沙門和西門，由此入城西北角的金城。這時期的城市常在西北隅築有金城，具有類似寨堡的作用。金城得名是因為其城牆堅固如鐵石，地勢又較城之別處為高亢。²³ 另

18 《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68。

19 對帝制中國大城申日常活動的一個有用的描述可參 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UNY Press, 2006), pp. 150-169.

20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8〈魏書·諸葛誕傳〉，頁 770；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76，頁 2424。

21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5〈州郡志〉，頁 1033-1034。

22 關於僑居的行政安排和相關問題，請參 William G. Crowell, "Northern Émigrés and the Problems of Census Registration under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Albert E. Dien,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1-210.

23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頁 480。西元

有一方位不明的義門，可能在城東。在西門上有逍遙樓，城東北角有東臺。其他各城牆上可能也有類似的樓、臺（詳下）。²⁴ 芍陂瀆經芍陂門之西，由南方穿城南牆而入，貫流城中南北，成爲城中水源。渠水右側爲東都街。這裡可能有市場。門北東鄉的孝義里，有劉宋司空劉劭廟。西元 467 年，豫州刺史殷琰據壽春叛亂，劉劭奉命平亂。劉劭成功平亂，未傷壽春人命，獲得贊頌。²⁵ 在渠水稍北和稍西有劉裕在西元 419 年所建的相國城。這是他被任命爲宋王時，在壽陽所建的都城。²⁶ 酈道元在數十年後訪壽春時，相國城的堂室、廂房仍存，似乎也仍在使用。渠道仍朝北，出北城，入肥水。²⁷ 《壽陽記》提到城中有樓兩座，但其所在不可知。其一爲望仙樓，劉裕曾於 420 年（？）元月初七登樓。此樓可能位於城牆之上，因爲《壽陽記》說「會群臣父老集於城下，令皆飲一爵，文武千人拜賀上壽」。²⁸ 另一樓爲趙伯符在約西元 444 年任豫州刺史時所建的明義樓。它可能坐落在義門上，因而也在明義樓街的盡頭。此門可能在東城牆，蓋城東無可考之門名。義門社有幾百人，每年九月九日在明義樓街奏樂布施以供冬。²⁹ 另外每月某日樓上奏樂，男女盛裝於樓下觀戲。³⁰ 樓之南有一明義井。夏日，人們享受冷漿和甘飲，來往皆持絹或羽扇之人。據云若值酷暑，「男女行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

574 年當陳將吳明徹攻打壽春時，守衛的北齊軍退入金城和相國城。吳明徹斷肥水灌城，城破。參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9〈吳明徹傳〉，頁 162；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66〈吳明徹傳〉，頁 1622。

24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四庫善本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卷 32，頁 6 下-10 上。

25 《水經注》，卷 32，頁 9 下，謂叛變發生在西元 466 年，但《宋書》，卷 8〈明帝紀〉，頁 156，繫於西元 467 年。

26 《宋書》，卷 2〈武帝紀中〉，頁 45。

27 《水經注》，卷 32，頁 10 上。

28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15，頁 8 下引《壽陽記》；明·陶宗儀，《說郛》（《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69 下，頁 12 下引《壽陽記》作「十」。從引文和所涉之人觀之，較大的數字可能較可信。

29 宋·李昉，《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子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卷 32，頁 5 上引《壽陽記》。

30 《說郛》，卷 69 下，頁 12 下-13 上引《壽陽記》。

言」。因人們如此歡喜此井，井又被稱之為歡樂井。³¹樓中有沐浴之室三座，上者唯王侯宰吏可用，中者供君子士流，下者供庶民百姓使用。³²這清楚反映了這時的社會層級結構。

城中還有其他的水井，據說其中九井相連，一處汲水，他處之水即流入。地方百姓相信此中必有神異，以致不敢汲水，以免觸犯神靈。³³這類宗教信仰的活動是壽春住民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壽春市內和周圍附近都有不少重要的寺廟。為了慶祝釋迦二月八日和彌勒四月八日的生日，信徒奏樂環遊市區。³⁴由於壽春置於南北要道，也是僧眾從西北方到建康及以南的佛教中心必經之地。在呂光攻取龜茲時，罽賓僧人卑摩羅叉為避亂而東渡，到達長安受到翻譯經文名師鳩摩羅什敬重相待。西元 413 年鳩摩羅什逝世後，羅叉來到壽春，居住在石礪寺（位置不明），律徒雲集向他學習受戒法。³⁵在此時期因西夏赫連勃勃入侵長安，在 418 年釋僧導法師也逃往壽春。當時劉裕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守長安，在撤出途中受僧導相助得以逃脫。劉裕相當感激就命令自己的子姪們作為俗家弟子拜他為師。在壽春，僧導修立東山寺，在此經常講說佛教經論，有一千多人跟他學習。446 年北魏太武帝滅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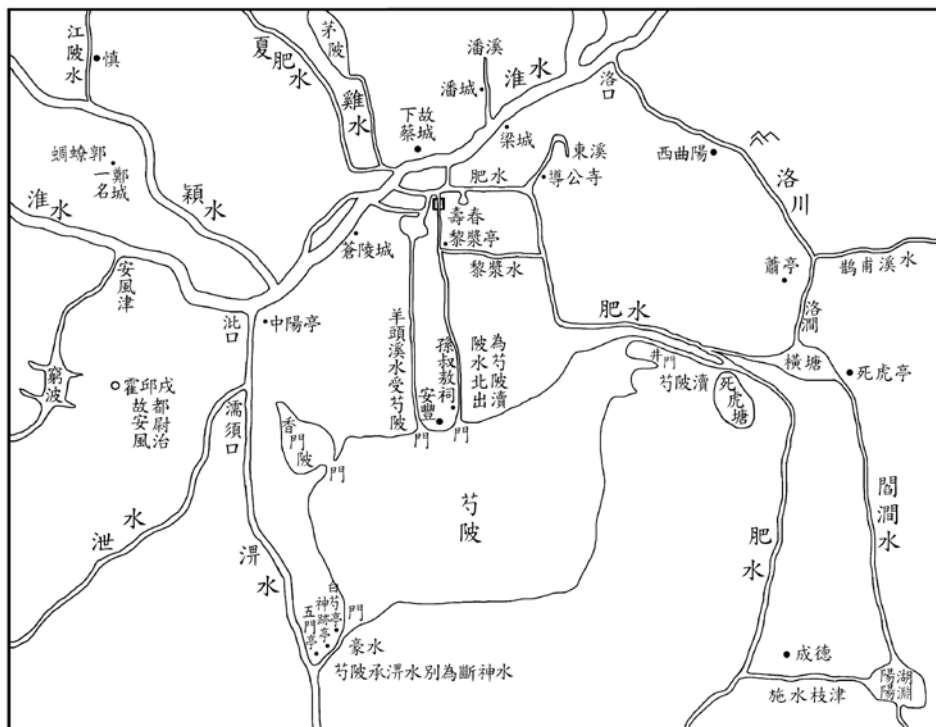
31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3 號光盤），卷 129，頁 5 上引《隋圖經》；明·陳耀文，《天中記》（《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10，頁 57 上引《壽陽記》。

32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10，頁 24 上引《壽陽記》；清·張英等，《御定淵鑑類函》（《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14，頁 11 上引《壽陽記》。

33 《太平寰宇記》，卷 129，頁 8 下。樂史（930-1007）認為這一段描述是郭璞（276-324）為《山海經》所作之注，但不見於今本《山海經》。它們的位置不明，可能在城外。參清·楊守敬（1839-1915），《水經注疏要刪》（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影印觀海堂光緒三十一年刊本），卷 32，頁 5 上。九座相連的井是一個道教母題，也常見於壽春以外的地方。它們常被描述為源自或和老子或神農有關。參例如《水經注》，卷 23，頁 5 下；卷 32，頁 1 下；《太平寰宇記》，卷 29，頁 23 上；卷 47，頁 14 上；卷 105，頁 5 下；卷 142，頁 6 上；卷 144，頁 3 上；《太平御覽》，卷 189，頁 6 下、7 上；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9，頁 29 下；宋·王應麟，《玉海》（《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卷 24，頁 1 下。

34 宋·羅泌，《路史》（《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2 號光盤），卷 10，頁 24 下上引《壽陽記》。

35 梁·慧皎，《高僧傳》（臺北：臺灣印經處，1973），卷 2，頁 43-44。



圖三 芍陂位置圖（據楊守敬《水經注圖》改繪）

時，沙門數百人投奔他處避難。僧導贈給他們衣食，且為死在胡虜手中的人設立法會燒香。劉裕稱帝時，曾派使者請僧導到建康。僧導應詔前往，幾年後回到壽春，在石礪寺逝世，享年間雜歲。³⁶

壽春的範圍固因其地理位置，也因人口和結構而決定。在壽春城南八十里外有芍陂。據酈道元估計，芍陂徑 120 里（1 里約當 0.54 公里）。³⁷ 據舊說，芍陂可灌田萬頃（1 頃約當 4.6 公畝）。這個數字恐不可靠。不過，衡以其不斷維修，芍陂對壽春而言，無論在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都十分顯然。它有兩條人工渠道將水北送到壽春城。一條是前述的芍陂瀆，另一條是羊頭溪。羊頭溪經過壽春城西牆，流入城西北的肥水。壽春另一側以肥水為界，雖然

36 同上註，卷 7，頁 190-192。

37 《水經注》，卷 32，頁 7 上。

肥水和城東牆之間還有些距離。在城南黎漿口，河流的一部分往西流到黎漿亭合於芍陂瀆，主河道朝北經長瀨津，這裡或曾有津渡。在津渡旁有謝堂。謝堂是水陸旅客啓程和抵達之處。稍遠，肥水與東溪合流，其旁有導公寺和五層寶塔。肥水由此西流，經城東北角之東臺。東臺下有湖，春夏紅蓮如茵。

肥水由東臺西流經城北牆。在石橋門外有草市，因而石橋門又俗稱草市門。這一類草市常見於城外，買賣當地土產。草市是因市場建築以草爲頂而得名。³⁸ 肥水在此有一石橋橫跨，橋北連北洲，北洲島位於肥水和故道之間。故道塞而成湖，成爲船官所屬軍民船隻停泊之所。負責水軍的「蒼兕」和負責渠道與水運的都水，共用島上官署。在島上緣有西昌寺，供奉梁武帝所立三佛。酈道元謂其「精煒」。³⁹ 在島上緣故道北岸有玄康城。玄康城之南街與壽春有馳道相通。這是壽春周邊類似防禦城鎮群中的一個。

在北洲稍遠，還有一些地點使壽春知名。在故道口上游，有北溪，自北山流入肥水。在溪東岸，可能更近山之處，有山林精舍；西岸有山淵寺和陸道士解南精廬。⁴⁰ 稍朝西爲八公山，僧俗交遊於此，摩肩擦踵。廟宇中人及各地人皆於此取泉水，號稱水如「七淨」。⁴¹

八公山是壽春指標性地景，也是壽春歷史敘述中重要的元素，以西元383年肥水之戰（詳後）的戰場之一，以及和淮南王劉安相關的民間神話而著名。從酈道元時代的壽春城外望，八公山光禿無樹，聳立於船官湖之後。⁴² 山上有石井和相傳屬劉安的隱室。另有一廟，有佛造像、劉安和八公

38 同上註，頁8下。「草市」是相對於正式有城牆的市鎮。它們是在市鎮以外交通和貿易方便之地興起的，有人居，也有商業活動。參《資治通鑑》，卷144，頁4492；卷281，頁9174；宋·蘇軾，〈乞罷宿州修城狀〉，《東坡全集》（《欽定四庫全書》，文第207號光盤），卷62，頁22下；范文瀾，《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修訂本），第3編第2章，頁325；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頁3-8。

39 《水經注》，卷32，頁8下。

40 陸道士爲何人，不明。

41 按「七淨」語出鳩摩羅什所說戒淨、心淨、見淨、度疑淨、分別道淨、行斷知見淨和涅槃。

42 肥水之戰時，八公山上有樹有草。一百四十年後，山禿無樹，當是因爲壽春戰爭不斷，需要大量木材用於炊食、取暖、築寨堡和修堤壩等等。

畫像。他們都坐於榻上，酈道元謂其如常人居家一般。廟前有西元 471 年齊帝子孫，豫州刺史蕭遙昌所立之碑，裴邃（詳下）受命所撰碑文深受好評。⁴³

據傳說，劉安曾贊助無數通神仙鬼神、秘藥、煉金之術者。某日八公忽來求見劉安。衛士對八公說王欲求長生，除非來客知卻老延年之術，否則不通報。據說八公頃刻化為少年，劉安大為敬重，片刻不離八公之側。他們能化金成丹，隨劉安登山，埋金於地裡後白日飛升上天。器皿還留下飛升仙藥，雞犬舐過的，都升天了。據云其地尚有人馬腳印可見。不過，酈道元說他僅見廟、造像和一件南齊（西元 492 年）的碑。⁴⁴

肥水西向流過八公山和北洲，與羊頭溪會合，在合流會形成船官湖。從此，肥水經過了在北岸的曲水堂。曲水堂為百姓遊樂之地。離曲水堂不遠，肥水即和淮水合流。

四、壽春：一個經濟中心

壽春無疑十分發達，是這一地區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淮南資源豐富，經濟潛力雄厚。《尚書》〈禹貢〉大概是西元前三世紀的著作，它所描述戰國時代的揚州，或可提供一個背景。〈禹貢〉謂揚州貢金三品（一說指金、銀和銅）、瑤、琨寶石、象牙、皮革、羽毛。此區之土雖被評為「惟塗泥」，田等「下下」，賦列「下上」，賦等高於田等似乎意味著天然資源豐富。⁴⁵ 〈禹貢〉所記不可全信，但它的描述和《晉書》的記述十分相似。《晉書》所引約作於西元 370 年伏滔的《正淮》，其中對淮水的描述十分相似。據伏滔《正淮》，淮南河湖沼澤不受洪旱影響，因此百姓於荒年仍有食物可以採集。《晉書》所

43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28 〈裴邃傳〉，頁 413。

44 酈道元在《水經注》序言曾說其注所用資料得自文獻和其他人的旅行紀錄。但在此，他清楚地說：「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見《水經注》，卷 32，頁 9 上。

45 參 Bernhard Karlgren (高本漢), trans., "The Book of Documents,"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2 (1950): 14;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四部備要》經部，臺北：中華書局，1988），卷子中，頁 1 上 -3 上。史念海認為〈禹貢〉約成於西元前 370-362 年間，無論如何不會晚於 334 年，而且可能是魏人的著作。參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 391。

述和〈禹貢〉主要的不同，在於多了「龍淥陂」可灌田一萬頃這一記載。⁴⁶ 司馬遷在西元前一百年左右，稱述壽春爲「一都會」，他可能曾親遊此地。⁴⁷ 自劉安以後，淮南國雖被分割另成廬江郡，但淮南國全境縮小，人口反增。這一部分是因爲西元前 138 年和 110 年兩度將東越人口全部「移至江淮間」。⁴⁸ 西元 2 年，淮南有戶 150,052，口 785,025，是 103 郡國中人口最多的第 23 位。⁴⁹ 據西元 140 年的人口調查，淮南有戶 89,436，口 432,426。⁵⁰ 可惜，我們無法知道人口中種族的構成。

隨著西漢人口增加，人們自然會期待經濟的同步發展。討論這一課題，有幾點極有趣的問題可以注意。像壽春這麼重要的城市，它和鄰近區域之間必然有一個內在的經濟結構關係。可是晚至東漢，此地的糧食種植都還算不上十分發達。西元 83 年，當王景任相鄰的廬江太守，發現芍陂（與廬江郡界相接）失修，百姓不知牛耕。他修陂池，使耕地倍增，又教民蠶織。⁵¹ 芍陂距壽春不過八十里左右，自西元前一世紀即已建成並使用。⁵² 即使壽春和淮水流域其他的城鎮足以成爲糧食消費市場，芍陂居然墮敗至此，百姓居然

46 《晉書》，卷 92〈伏滔列傳〉，頁 2400。

47 《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68。

48 東越在江淮間曾兩度遷移，一次在西元前 138 年，當東越遭閩越連番入侵而要求入屬。見《漢書》，卷 64 上〈嚴助傳〉，頁 2776；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頁 3860。第二次發生在西元 110 年。東越殺其王，歸降漢朝。武帝因東越迭生叛亂，爲求後世之和平，命其再遷。《漢書》謂「其地空」，意即應曾有不少人口被遷移。《漢書》，卷 6〈武帝紀〉，頁 190。

49 《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頁 1568；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16。

50 晉·司馬彪，《後漢志》（收入《後漢書》），卷 22，頁 3485。這造成 48% 人口的減少。這一部分由於政區重劃，廬江郡有四縣劃入他郡，但也增加三縣。較明確的是西元 2 年，每縣平均有人口 10,003.47，每戶約 5.20 人；西元 140 年，平均每縣人口變爲 6,388.29，每戶約 4.81 人。梁方仲估計西元 2 年全郡面積 37,710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爲每平方公里 20.7 人；西元 140 年，面積爲 37,710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爲 11.5 人。面積似乎不宜如此比較。參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頁 16、19、24、26。

51 《後漢書》，卷 76〈王景列傳〉，頁 2466。

52 傳統上認爲芍陂爲西元前六世紀楚國名相孫叔敖所建。此說已遭嚴重挑戰，一說芍陂應成於戰國之世。我認爲芍陂可能建於西元前一世紀早期至中期之間。見 William Gordon Crowell, "History and Tradition: The Origins of the Quebei Reservoir," *T'oung Pao*, 待刊。

不知牛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此地百姓本不經營田作。此地富於天然食物，當地非漢居民或自南方遷來的越人在文化和習慣上原都排拒農耕。司馬遷曾有具啓發性的描述：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⁵³

這種情況到司馬遷兩百年後的王景時代很可能仍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王景所見所為，完全符合〈循吏傳〉描述循吏為華夏邊緣地區帶入中國文明和進步的農耕技術的模式。⁵⁴

在漢代，壽春的經濟基本上明顯是依賴貿易。據司馬遷和其他人的記載，漢代南北交通發達。西元四世紀晉代官員伏滔所描述的景況，可能自西漢末以來即已如此。他說壽春「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⁵⁵ 壽春正位於淮水和北方都會區最接近以及南方較發達的江南地區的交會處。⁵⁶ 由於肥水和施水的源頭都臨近現在的合肥，這使得壽春和長江之間的水運依賴很短的陸上運輸即可銜接。⁵⁷ 壽春商人除了供應壽春城本身的需要，更可獲南北交易之利。這包含

53 《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70。

54 參《後漢書》，卷 76〈循吏列傳·王景〉，頁 2466；《三國志》，卷 53〈吳書·薛綜傳〉，頁 1251。

55 《晉書》，卷 92〈伏滔列傳〉，頁 2399-2400。六朝時南北之間的貿易參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219-232。

56 服部克彥，《古代中国の都市とその周辺》（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66），頁 271。關於南朝江南的商業發展可參 Shufen Liu, "Jiankang and 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edieval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Scott Pearce, Audrey Spiro and Patricia Ebrey, eds.,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35-52；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81-109。

57 周定一、張中和，〈施肥源頭何在〉；周定一、周經寶，〈江淮古運河（肥水古航道）考略〉；馬騏、高韻柏、周克來，〈將軍嶺古「江淮運河」的考察及發現〉，收入安徽水利志編輯室、安徽省水利學會水利史志專業委員會編，《江淮古運河考證》（合肥，2000，複印件）。有些學者認為兩河間有運河相連，使江淮成為連續的水道。但是馬騏、高韻柏、周克來基於田野調查，從地勢排除了兩河相連的可能。施肥間有十公里的陸路，但他們

交易北方所需淮南和江南所產的奢侈品。曹丕使者至吳地想要獲得的物品清單可以當作一項指標：「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⁵⁸ 南方人則欲購買北方的畜產，尤其是馬匹。西元 235 年，魏使至吳以二百匹馬換珠玉。⁵⁹ 北方向南方購買甘蔗、柑橘、酒和其他製造品，包括樂器、棋盤和其他娛樂器材、蠟燭和絲綢。南方也買毛氈和不同的鹽。尤有甚者，當中國分裂爲南北朝，壽春作爲貿易中介的地位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⁶⁰ 南北之間建立「互市」，使貿易仍能在敵國間進行。⁶¹ 某些沼澤和林地的自然物產在壽春和周邊都有市場。當地生產的稻米有些供應當地農民之需，有些供應壽春城市居民，如小有剩餘，也可能供應其他地方。但餘糧的缺乏可從漢末之後不斷有人建議在淮南建立農屯，甚至以屯民取代一般百姓，以支應駐軍之需的討論看出來。可是，只要帝國維持統一，壽春以其所居的位置都不難從淮北和更東部產糧的地區交易它所需要的物品。

五、壽春益增的戰略地位

壽春的地位和意義因漢帝國陷入軍閥混戰而發生顯著改變。軍閥中有些人打著維護劉氏江山的旗號。宦官世族子弟的袁術即爲其一。他在壽春立都。西元 197 年，袁術僭號稱帝，稱仲氏，僅兩年，即病死。⁶² 漢朝雖然名

還是認爲這些河是江淮間重要的水道。我要感謝安徽省水利廳的何紀先生贈送這些論文的複印件。

58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頁 1124。

59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頁 1140；唐·許嵩，《建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2〈太祖下〉，頁 30。

60 張承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交往〉，《中國史研究》1994.3: 86-87。

61 王鑫義，〈魏晉南北朝時期淮河流域的商業和城市〉，《史學月刊》2001.5: 110-115；高敏，《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 2 冊，頁 967-973；許輝、蔣福亞編，《六朝經濟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 370-374；張承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交往〉，《中國史研究》1994.3: 86-87；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 219-223。

62 《三國志》，卷 6〈魏書·袁術傳〉，頁 209-210；《後漢書》，卷 75〈呂布列傳〉，頁 2442-2443；《資治通鑑》，卷 62，頁 1996；卷 63，頁 2014；Rafe de Crespigny, trans. & annot., *To Establish Peace, Vol. 1, 189-200*.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義上仍然存在數十年，但已分崩，落入若干相爭軍閥的控制之下，最後成爲魏、蜀漢和吳三國相爭的局面，直到西元 280 年晉暫時恢復了統一。西元 317 年晉朝再度分崩爲南北朝達兩百五十餘年。

在這個新的政治地理形勢下，壽春變成重要的貿易樞紐，又成爲戰略的中心。⁶³ 其戰略地位吸引了日後南宋和當代學者的注意。其意義的變化又表明它已成爲一個重要的糧產地。淮南地區成爲北方曹操（155-220）和南方孫權（182-252）的戰場。曹操覺悟到控制此地的必要性，屯兵於此。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是在政治和經濟的亂局中如何保證供應軍糧。西元 196 年曹操破汝南和潁川郡的黃巾後，即曾遭遇類似的供糧問題。因此，當他在潁川郡的許建都，他從兩位部將之議，在許行屯田。

屯田本行於漢代西北防匈奴的邊塞，許都的屯田卻爲民屯，以屯民作爲租賦的來源。⁶⁴ 西元 209 年，曹操擴大了他對淮水以南地區的控制，命揚州刺史劉馥擴大屯田，經營芍陂和其他水利設施。除此之外，劉馥增修城壘，積石木，編草苫至「千萬」，儲魚膏至數千斛（一斛約當 29 公升），以備許都防禦之需。⁶⁵ 防禦工事可能包括城外的要塞和城牆本身。文獻中曾約略提

Series, no. 21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6), p. 216, 250-251; and Rafe de Crespigny, *Generals of the South: The Found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Wu*.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no. 16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0), pp. 148-158, 172-175.

- 63 參徐益棠，〈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中國文化研究彙刊》8(1948): 53-64。
- 64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頁 14。民屯是動亂之世由官吏監管，爲收輯流亡，返歸田畝，以穩定農業生產而設。參鞠清遠，〈曹魏屯田〉，《食貨》3.3(1936): 39-45；鄭欣，〈曹魏屯田制度研究〉，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探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頁 68-70；金家年，〈論曹魏江淮屯田與水利建設〉，《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4: 84-90；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 48、212-213；西嶋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頁 297-378；William G. Crowell, "Government Land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9), chapter 4.
- 65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頁 32；卷 15〈魏書·劉馥傳〉，頁 463；《晉書》，卷 26〈食貨志〉，頁 784；《資治通鑑》，卷 58，頁 2098；金家年，〈論曹魏江淮屯田與水利建設〉，頁 84-90；韓國磐，〈魏晉南北朝時的芍陂屯和石龜屯〉，《安徽史學通訊》11(1959): 55；王鑫義，〈曹魏淮河流域屯田論述〉，《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5(2000): 106。草苫和魚膏可能用於起火。赤壁之戰，吳將黃蓋利用魚膏焚燒曹操戰

及，可惜要塞的確實位置無考。八公山可能是要塞所在。⁶⁶屯田之制雖收效一時，壽春附近的屯田在漢末不停的戰亂中卻不易維持。其中一個原因無疑是軍屯之制尚未建立。軍屯之制要到曹丕黃初年間（220-226）才完成。⁶⁷也只有南北分裂大勢底定，局面稍穩之後，屯田才可能大規模推展。

西元 220 年曹操死後，曹丕廢漢帝，建魏國，開啓了三國時代。壽春由此成爲北方的魏和南方的吳衝突的焦點。維護芍陂以支援屯田從此受到關注。西元 241 年，據載吳將全琮曾率上萬人馬攻芍陂。全琮雖被擊退，他在撤退前還是決堤芍陂，燒毀芍陂北端安城的邸閣，收其人口。⁶⁸他的行動必然會使芍陂的蓄水盡失，因爲吳中郎將秦儗曾和魏將王淩在芍陂之中大戰，殺或俘上千人。⁶⁹倘使此前芍陂仍有屯田，此後就不再有了。此後不到兩年，太尉司馬宣王因欲攻吳而積糧備戰，曾遣尚書郎鄧艾探查自陳、項（現在河南東部）至壽春和鄰近的區域。鄧艾在探查的報告裡提到「田良水少」。他建議修渠道以利運輸和積糧。他提到許都屯田成功，建議在淮北屯田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他估計六七年間，即可在淮土積糧三千萬斛，足支十萬兵五年之需。西元 243 年，其建議獲准，於壽春西北的鍾離和橫石之間，每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兼修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淮南、淮北皆相連接，從壽春到京師洛陽，變得阡陌相屬，雞犬相聞。⁷⁰

艦是有名的故事。參《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頁 1263。魚膏也可用於照明，例如秦始皇陵。見《史記》，卷 6〈武帝紀〉，頁 265、266。

66 《宋書》，卷 5〈文帝紀〉，頁 99；《南史》，卷 55〈康絢傳〉，頁 1375。

67 這類觀點參鄭欣，〈論司馬懿〉，《魏晉南北朝史探索》，頁 401。關於內地軍屯，參 William G. Crowell, "Government Land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 152-157, 176 note 29。

68 我們無法判定全琮是企圖摧毀農作或以決堤作爲對抗魏軍的水戰策略。參《三國志》，卷 4〈魏書·三少帝紀〉，頁 119；卷 28〈魏書·王淩傳〉，頁 758；卷 47〈吳書·吳主傳〉，頁 1144；卷 52〈吳書·顧雍傳〉，頁 1225、1230、1231；《晉書》，卷 1〈宣帝紀〉，頁 14；唐·許嵩，《建康實錄》，卷 2，頁 34。

69 《建康實錄》，卷 2，頁 34：「中郎將秦儗等與魏將王淩大戰芍陂中，斬獲千餘人。」

70 《三國志》，卷 28〈魏書·鄧艾傳〉，頁 775-776；《晉書》，卷 26〈食貨志〉，頁 785-786；Lien-sheng Yang, "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 in Lien-sheng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67-170.

鄧艾所為大大提高了壽春的戰略重要性。在導致魏國勢力衰退和司馬氏興起，並於西元 265 年建立晉朝的鬥爭中，此地都成為必爭的堡壘。⁷¹ 西元 249 年司馬懿奪權政變後兩年（251），太尉王淩據壽春叛，謀立另一司馬氏子弟為帝失敗。⁷² 西元 255 年，揚州刺史文欽和鎮東將軍毌丘儉因懼掌權的司馬氏加害，假傳詔書，於壽春舉兵五六萬人叛變。他們被擊敗，毌丘儉被殺，其家屬為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所害。諸葛誕遂而據壽春。他眼見毌丘儉和其他將軍先後被殺，而自己與他們又多少有牽連，變得十分不安。遂假防備吳國之名，增強自己在壽春的力量。

可是司馬昭強迫諸葛誕赴京師，升任司空。諸葛誕洞悉司馬昭之令暗藏殺機，估計自己擁有十萬屯田兵，另有約四五萬新俘，此外還有足支一年的糧儲，遂不應召而留在壽春，並謀以吳國為奧援。如此他為一場極重要卻為人們所忽視的戰爭布置了舞臺。⁷³ 司馬昭立即包圍壽春。諸葛誕支撐近一年，但吳軍始終無法為諸葛誕解圍。支持諸葛者漸叛去，諸葛欲逃被俘，處死。⁷⁴ 司馬昭至此消滅了所有的敵人，建立晉朝。

71 Damien Chaussende,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Légitimation du pouvoir impérial en Chine au III^e sièc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0), p. 245.

72 《三國志》，卷 28〈魏書·王淩傳〉，頁 759；Achilles Fang, trans.,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ū Chih T'ung Chien of Ssū-ma Kuang (1019-1086)*, edited by Glen W. Baxter and Bernard Solomon,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 2, pp. 82-85, 89-92; Damien Chaussende,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pp. 190, 193-196.

73 任昭坤，〈三國壽春之戰為何被冷落〉，《安徽史學通訊》1986.6: 63-64；任氏指出此戰有三大特點，和其他三國時期的戰爭不同：（1）雙方動員兵力最大，共達約五十萬人；（2）在攻城前，勝利的一方表現了優秀的指揮統御，集中兵力打敗吳軍；（3）此戰影響鉅大，使司馬氏建立了超越曹氏的穩固地位，終至建立晉朝。此戰被冷落的原因，照任氏之說，是因為（1）司馬氏長期被視為篡位者和乏善可陳的統治者；（2）對手諸葛誕等人被錯誤地認為不足一提的人物；（3）此戰被認為僅是一次內部的衝突，無法和三國時其他「英雄式」的大戰相比；（4）此戰在宋代未能像其他戰役（如關渡、赤壁之戰等）引起注意，也在宋朝未能寫入話本及《三國演義》，有關司馬昭圍壽春的記述十分枯燥無味。

74 《三國志》，卷 4〈魏書·三少帝紀〉，頁 141；卷 13〈魏書·鍾毓傳〉，頁 400；卷 27〈魏書·王基傳〉，頁 750、754；卷 28〈魏書·毌丘儉傳〉，頁 765-766；卷 28〈魏書·諸葛誕傳〉，頁 769-774；卷 28〈魏書·州泰傳〉，頁 785；卷 48〈吳書·孫亮傳〉，頁 1152-1155；卷 56〈吳書·朱異傳〉，頁 1315；卷 64〈吳書·孫綝傳〉，頁

西元 280 年隨著滅吳征服南方，晉朝完成一統，壽春不再是南北敵國間的邊防要地，暫時失去了戰略上的地位。可是西元 317 年以後，西晉失去北土，移都建康，壽春甚至超越位於其西的襄陽，再度成為戰略要地。⁷⁵ 其地至屬關鍵。因為無論東晉或此後的南朝各代，無不以壽春為國防樞紐和北征的跳板。同樣的北朝南征也無不以壽春為目標；如不先佔壽春，幾無可能征服南方。⁷⁶ 這一事實是南北朝時人們的共識。而且我們將會看到，這一認識也反覆出現在南宋的政策辯論中。

由於南朝認識到壽春在防禦和北征上的重要性，西元 319 年後軍將軍應詹曾建議在他稱之為「一方之會」的壽春設置有軍民大權的都督，掌監早已落入後趙之手的灤水和黃河之區，守備淮水之北的徐、豫二州。西元 322 年，當應詹被後趙石勒逐出淮北的焦，祖約被任命為鎮西將軍，鎮守壽陽，以為「北境藩扞」。⁷⁷ 這是壽春成為南朝抵禦北胡重鎮的開始。⁷⁸

壽春成為戰略重鎮的另一項要素是它在芍陂和其他淮南地區擁有的農屯。⁷⁹ 這區龐大的農屯成為西元 353 年殷浩能集七萬之師，企圖北征的後盾。⁸⁰ 西元 417 年劉裕準備北伐後秦時，曾遣毛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

1447；《資治通鑑》卷 76，頁 2419-2421、2423-2425；卷 77，頁 2436-2444；宋·袁樞（1131-1205），〈淮南三叛〉，《通鑑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頁 902-911；Achilles Fang, trans.,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ū Chih T'ung Chien of Ssū-ma Kuang (1019-1086)*, ed. by Glen W. Baxter and Bernard S. Solomon, pp. 190-197, 259-264, 290-293. 關於諸葛誕的叛變以及相關的政局，有一極精彩的討論，見注 64 引；Damien Chaussende,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pp. 204-209.

75 徐益棠，〈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頁 54。

76 壽春當然不是唯一的戰略要地。高閭除提到盱眙和淮陰（《魏書》，卷 54〈高閭傳〉，頁 1207），還言及荆州的襄陽和蜀地。在當時的戰略思考中，後二者因控制長江上游，是進取下游建康的跳板而成戰略要地。這樣的戰略思考例如可參《三國志》，卷 2〈魏書·文帝紀〉，頁 38；Damien Chaussende,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pp. 246-247.

77 《晉書》，卷 100〈祖約列傳〉，頁 2626。

78 徐益棠，〈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頁 58。

79 《晉書》，卷 26〈食貨志〉，頁 791-792；Lien-sheng Yang, "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 p. 184.

80 《晉書》，卷 77〈殷浩列傳〉，頁 2045；《資治通鑑》，卷 99，頁 3134。

頃」。⁸¹ 劉裕雖成功拿下長安，名義上由其十二歲之子掌理，可是不到一年長安即又落入大夏皇帝赫連勃勃之手。⁸²

西元 480 年，壽春遭北魏號稱二十萬之師圍攻。豫州刺史垣崇祖計誘魏軍，以預畜之大水淹之，溺斃人馬無數。此後，南齊高帝因糧缺不足以禦淮水，令垣崇祖重修芍陂。⁸³ 南齊末年（西元 500 年），裴叔業因懼新帝東昏侯在一場誅殺亂黨的迫害中受害，降北魏，壽春隨後失陷。⁸⁴ 從此北魏控制壽春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隨著精強力盛的梁武帝創建梁朝，為規復壽春而在歷史上留下了兩段不平凡的事蹟。其一發生在西元 504 年。北魏任城王元澄受命為揚州刺史，統淮南之軍，其母太妃孟氏隨軍駐在壽春。元澄出征在外，壽春遭梁大軍進攻，謀取外城。北魏留守將領倉促失圖，計無所出。元澄母孟氏代起指揮，「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甚至「親自巡守，不避矢石」，直到援軍至而梁軍退去。⁸⁵

十年以後，壽春仍在北魏之手。不過北魏一降將向梁武帝建議築堤以淮水灌地勢較低的壽春城。梁武帝不顧水利專家的反對，執意於西元 513 年秋依計而行。約二十萬軍民受命在壽春下游八十公里淮水南之浮山和淮北巉石，從兩頭向河中築堤，第二年春堤合。奈何水流甚激，堤破。有流言說蛟龍不欲堤成，因而沉千萬斤（約合 2443 公噸）鐵工具等於堤破處，據說因蛟龍憎惡鐵。雖然無效，不過最後發淮水兩岸百里內各色木石，終於在 516 年春築成長 3.9 公里，底寬 339 公尺，頂寬 109 公尺，高 48 公尺，畜水深

81 《宋書》，卷 48〈毛脩之傳〉，頁 429。

82 《晉書》，卷 10〈安帝紀〉，頁 266；《宋書》，卷 2〈武帝紀中〉，頁 42、44；卷 61〈武三王列傳〉，頁 633-634；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97〈島夷劉裕列傳〉，頁 2133-2134；《南史》，卷 1〈宋本紀上〉，頁 20、21；卷 13〈劉義欣列傳〉，頁 363-364，卷 57〈沈田子列傳〉，頁 1406。

83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2〈高帝本紀下〉，頁 36；卷 25〈垣崇祖張敬兒列傳〉，頁 463、476；《資治通鑑》，卷 135，頁 4236。

84 《南齊書》，卷 51〈裴叔業〉，頁 871；《資治通鑑》，卷 143，頁 4458-4460。裴叔業不及見壽春易手而病卒。其侄裴植成之。

85 《魏書》，卷 19 下〈任城王澄傳〉，頁 472；卷 92〈任城國太妃孟氏〉，頁 1983；《資治通鑑》，卷 145，頁 4536-4537。

45 公尺的大堤。爲防北魏破壞此堤，蓄水淹漫數百里。壽春的北魏軍被迫移駐八公山，居民皆逃往高處。壽春城因水受損，水清以致居民可見田園廬墓盡在水底。梁朝爲此堤勞民傷財無數，不幸無力維護，到 516 年夏，因淮河水漲，堤潰，下游上萬居民因而溺斃。⁸⁶

西元 523 年，裴邃受命率軍收復壽春。他爲準備次年展開進攻，先於其冬修復芍陂。可是第二年六月，裴邃死，壽春因而要到 527 年夏才重回梁朝之手。⁸⁷ 梁朝末年因爭帝位陷入內亂，北齊乘機南征，西元 555 年奪壽春及江淮間之地。北齊控制壽春至 573 年南朝陳將吳明徹再度奪下爲止。可是不過數年，北周統一中國北方後，即南伐陳。西元 578 年，吳明徹先小贏而後大敗被俘。第二年，北周軍圍壽春，城破。此後，南朝即未能再奪此地，直到隋代統一中國。⁸⁸

南北朝末葉，壽春的戰略重要性已爲人所熟知。西元 490 年，北魏孝文帝不克控制淮南，他的鎮南將軍高閭在奏書中直言：「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⁸⁹ 他明白指出不據壽春，則無以取淮南；不取淮南，則無望征服江南。壽春是征服南方的關鍵。⁹⁰ 在隋代統一中國之前，北朝雖可攻佔壽春於一時，可是從未能由

86 《南史》，卷 55〈康絢列傳〉，頁 1374-1375；《資治通鑑》，卷 148，頁 4609、4615、4620、4621、4623-4624、4626；《水經注》，卷 30，頁 17 下-18 上；《淮河水利簡史》編寫組，水利部治淮委員會，《淮河水利簡史》（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頁 89-97；Hans Bielenstein, "The Six Dynasties, Vol. 1,"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8(1996): 197. Bielenstein 誤以爲築堤是爲壽春灌溉之用。

87 《梁書》，卷 3〈武帝本紀〉，頁 70-71，卷 28〈裴邃傳〉，頁 413、415；《資治通鑑》，卷 50，頁 4680。收復壽春必然曾是裴邃個人的心願。裴叔業決意降北魏時，裴邃和一批歸降者北徙，魏武帝命之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武帝後任命王肅鎮守壽陽，裴邃密圖南歸，固求追隨王肅而回壽陽。在西元 503 年左右，裴邃終於回歸梁朝。他雖曾在壽春生活，但沒有證據可證他和裴叔業有關。

88 《陳書》，卷 5〈宣帝本紀〉，頁 84、85、91、95，卷 9〈吳明徹列傳〉，頁 162、164；《南史》，卷 66〈吳明徹列傳〉，頁 1622。

89 《魏書》，卷 54〈高閭傳〉，頁 1207。

90 它當然不是往南的唯一孔道。高閭除了提及盱眙和淮陰，還有荆州的襄陽及巴蜀之地。在那時的戰略思考中，後二者十分重要。因爲它們控制長江上游，足以成爲進攻下游建

此更向南伐。

高閻之言無疑受到南北分裂約七十年後，西元 383 年肥水之戰的啓發。肥水之戰的梗概爲人所熟知，本文不打算再細述。⁹¹ 故事要旨爲前秦氐人（藏族一支）苻堅號稱統衆百萬，其中大部分爲非華夏之部族，企圖征服東晉，一統中國。苻堅本人親率主力南臨淮水的壽春。他誤信東晉之兵可輕易擊潰，率八千人輕兵兼行，取壽春。一名晉的反間引導秦之將領下令由進攻轉而退守壽春附近的肥水沿岸。前秦軍隊因將戰術性撤退誤爲全盤大撤退，陷入撤退和混亂的恐慌之中。更由於苻堅誤以爲壽春東北方八公山上的草木都是晉布置的軍隊，情勢更爲惡化。他隨之錯估晉兵多於己，匆忙下令撤回淮河以北。肥水之戰帶來的困局導致前秦的覆亡，在此後的南北朝時期，南方的中國王朝即不再面臨如此大規模的入侵。

苻堅在壽春挫敗，導致前秦的覆亡。六朝直到梁末，大部分時期雖都在北方的威脅之下，南方的中國王朝從未再受到如此大規模的侵擾。如前所述，拓跋魏曾有意奪壽春，但這是起因於南齊內亂，裴叔業歸降。一旦南朝在有力君主手上穩住局勢，北魏即無法長期守住壽春。高閻之言在數十年後的侯景之亂中也可得到部分驗證。

侯景背叛東魏失敗，率八百殘兵南逃壽春，重建其武力。他之所以能再起，得力於南朝梁武帝的支持。武帝不顧群臣反對接納侯景。此外，尤其重

康的最佳跳板。這樣一種征江南的思路是當時最主要的戰略思考原則。西元 260 年司馬昭之言即爲其例，參《三國志》，卷 2〈魏書·文帝紀〉，頁 38；Damien Chaussende,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pp. 246-247.

91 關於肥水之戰雙方戰略的精要敘述，可參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 73-79。在西方著作中對《晉書》卷 113、114 最好的譯介，見 Michael C. Rogers, trans.,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s no. 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Michael Rogers 認爲相關記述曾遭雙重扭曲。第一重爲南朝的史官企圖強調謝安的成就，第二重爲唐代《晉書》的撰修者試圖使苻堅成爲唐太宗的一個歷史教訓，因爲太宗正在思考進攻高句麗。事實上，他斷言根本不會發生過肥水之戰！反對他的學者，雖然強烈反對其說，但承認他的研究十分徹底，其書資料豐富。參 Donald Holzman 的書評，見 *T'oung Pao* 57(1971): 182-186。又參孫衛國，〈淝水之戰：初唐史家們的虛構？——對邁克爾·羅傑斯用後現代方法解構中國官修正史個案的解構〉，《河北學刊》2004.1: 77-83；Damien Chaussende,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pp. 92-93.

要的是他獲得夏侯譚鼎力相助。夏侯譚之父——夏侯夔，曾任豫州刺史，擁部曲約萬人，死後兵歸其子夏侯譚。夏侯譚的父兄親戚等都忠於梁，爲梁防禦北寇。夏侯譚卻與侯景聯手，派兵與侯景共同攻打梁都建康。夏侯譚爲示其忠，甚至去其姓之「夏」字，稱侯譚，以建立自己和侯景的義親關係。侯景稱帝最終失敗，爲親隨所殺。⁹²

我們必須承認侯景和苻堅之例在許多方面並不相同。但二者仍足以說明一旦佔據壽春，即大利於南征長江之地和南朝之都。大家不要以爲侯景自夏侯譚和其他人所得的助力是例外的情況。忠貞不二在此一時期並非堅定不移的道德信念。戰爭中戰敗之卒不是被殺，就是準備投入勝利的一方，其將領則像裴邃一樣，於或南或北之首都，接受文武爵職。⁹³ 不論如何，侯景之例證明他低估了肥水之戰的教訓，也就是說，要保住長江以南的統治，即必須先鞏固壽春和淮水的防線。一直到梁末，南朝都難以控制淮南之地。陳代雖曾短暫規復壽春，唯不久又失去，最後由隋統一天下。

無論如何，南北朝時期是壽春地位最突出的時代。它從此成爲王公貴人建業之都，壽春的地位因這些王公貴人的地位和行動而沉浮。不過，隨著南北分裂，壽春因本身位居數河交會之交通樞紐和南北邊界之間的地理位置而成爲要地。它變成企圖一統或阻止華夏一統者必爭之地。它因貿易和發達的農業足以供應軍需而在經濟上地位日增。相反的，從南方的觀點看，保衛江南和光復北方，壽春也是關鍵之地。這一事實可以說是南北朝時代的普遍共識，也在這時和此後南宋的無數政策議論中不斷被提出來。

六、壽春歷史的教訓和啓示

侯景之亂不僅清楚證明壽春的戰略重要性，也證明它對南方政權潛在的威脅。這兩個例子儘管足以說明壽春在南征上的戰略重要性，但它們並不

92 《梁書》，卷 28〈夏侯夔列傳〉，頁 422；《資治通鑑》，卷 161，頁 4979。關於侯景，可參 Scott Pearce, "Who, and What, was Hou Jing?" *Early Medieval China* 6 (2000): 49-73。夏侯譚對侯景的支援及其他，可參李萬生，《南北朝史拾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頁 74-82。當然以壽春爲基地的叛亂或侵略不止這兩次。

93 Hans Bielenstein, "The Six Dynasties, Vol. 1," p. 240.

是壽春戰略敘事最重要的因素。稱得上最重要因素的是西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戰。此戰為時甚短，卻製造了傳奇式的英雄和悲劇人物，被視為歷史性的關鍵，也是中國文化不淪於北方戎狄的標幟性的一刻。淝水之戰的重要性有很大一部分不在於它是歷史上的一個事件，而在於它成為激發愛國情操的敘事。

淝水之戰一直被視為中華文化能免於北方戎狄蹂躪的關鍵。後世多從汲取教訓的角度看待此一事件，北宋同樣面對北方「戎狄」威脅，學者議論政策多以苻堅為例，企圖了解他為何失敗。王安石和司馬光雖各有一套政治改革方案，但都認為苻堅如果不是驕傲自專和面臨內部的壓力，他是可能成功的。⁹⁴

這些官員不論從淝水之戰的結局得到什麼教訓，都無法阻止宋代不亡於金。西元 1127 年，宋室南渡。南宋的官員此時可以從較寬廣的角度回顧大分裂時代的南朝，這樣一個和南宋偏安類似的朝代。南宋朝臣分為兩大派：一為「鷹派」（借用現代名詞），包括主張收復北方的文臣武將，一為「鴿派」，力主和金人議和。兩派分歧的一大象徵是對建都何處的態度。鷹派主都江寧（今南京），鴿派主以較安全的臨安（今杭州）為都。起初，宋高宗較傾向於前者，甚至恢復江寧舊名，改稱建康，以示接續六朝之都。但高宗在南京僅三個月，即因金兵威脅，被迫南遷臨安。從此儘管鷹派催促，臨安終成首都。⁹⁵ 高宗轉而主和，主戰派的官員紛紛遭到解職、外放或處決。西元 1137 年，高宗日益不耐臣下的奏議，疑懼武將高漲的兵權會威脅到自己的帝位。⁹⁶

主戰派藉用六朝的歷史，在政策議論中，以古鑑今，尋找成功的戰略例證，支持自己的主張。他們的議論以戰略形勢為焦點，自然而然提到壽春和

94 《資治通鑑》，卷 106，頁 3348-3349；James T. C.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57; Michael C. Rogers,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p. 80 note 2.

95 Jing-sheng Tao, "The Move to the South and the Reign of Kao-tsung," in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decessors, 96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52-654.

96 Jing-sheng Tao, "The Move to the South and the Reign of Kao-tsung," pp. 677-689.

淮南之地。宋代發達的史學和史學方法孕育出許多以歷史例證爲方法的奏議和書籍。⁹⁷ 西元 1133 年，知建康府呂祉及屬下所奏〈東南防守利便〉即爲較早的一例。此奏認爲建國於東南之地，蜀（四川）、荆（湖北）和淮水一線乃戰略要地，必須環環相扣。這一線和南北朝時代的南北分界線基本上相同。他又主張從臨安移都長江左近，也就是建康。⁹⁸

南宋著名的史學家李燾（1115-1184），在其以古鑑今的名著《六朝通鑑博議》中也主張沿淮水建立防線。他認爲壽陽是屏障南方的關鍵，「外淮、淝之固，可以蔽內，壤土富饒，兵甲堅利。」這話不禁令人想起約八百年前的伏滔。李燾相信壽陽如安堵，則「壽陽安，則淮北有收復之望，河南有平蕩之期」。倘使僅以長江爲防線，如某些人所主張，則易使敵人過於接近，偵伺大宋防禦上的弱點。⁹⁹ 他的主張，不是一家之言。陳武的〈江東地利論〉也認爲壽春乃「江東捍蔽」。¹⁰⁰

和以上不同的是西元 1162 年，愛國心切的李舜臣上呈皇帝一千二百言的〈江東十鑑〉。所謂十鑑，是以南北朝時代南北的十場戰役爲借鑑。其中之一即謝玄肥水之役。李舜臣認爲此役獲勝主要在於運氣，也在於苻堅的失誤，而不在謝安的領導能力。他特別批評謝安不應在戰爭中繼續下棋的漫不經心態度，以及晉朝未能乘勝追擊，光復中原。他對謝安的抨擊實際上是指

97 James T. C. Liu,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pp. 31-36; John W. Chaffee, "The Historian as Critic: Li Hsin-ch'uan and the Dilemmas of Statecraft in Southern Sung China," in Robert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10-335.

98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70〈呂祉列傳〉，頁 11509。

99 宋·李燾，《六朝通鑑博議》（《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4 號光盤），卷 4，頁 2 上下，卷 9，頁 6 上下；Yoshinobu Shiba, "Li T'ao," in 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hi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76), pp. 585-591。關於李燾對壽春在南宋時代的戰略考量，參蔡崇禧，「李燾（1115-1184）《六朝通鑑博議》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4），頁 176-177。感謝 Jeff Howard 示知此一論文的存在。

100 陳武，《江東地利論》，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308 號光盤），卷 75，頁 28 上。此文極罕見，我無緣得見，其目略見於《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總目》。

桑罵槐，針對無意全力規復北方的高宗。¹⁰¹ 其子李道傳在西元 1204 年從更爲務實的角度，寫成〈江東十考〉。他認爲南朝獲勝是有充分軍事和後勤準備的結果，其撤退而成防禦之勢，是因爲人心所向。他所論考的十點分別是軍屯、統軍、召兵、軍資、行軍、漕運、水軍之利、騎兵之用、城防要則以及江防守則。¹⁰²

壽春在歷史上戰略地位之重要可以王應麟（1223-1296，他在世之年元取代宋）的話作爲總結。他的《通鑑地理通釋》雖針對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但對當世的執政者發出了一份主張一統的讜言：

今安豐軍，古壽春也。其城築自楚考烈王徙都而經始焉。南北剖分爲疆場，戰爭之地。謝玄肥水之陽却苻秦百萬之師。劉仁瞻堅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世宗不能久處淮南，蓋仁瞻當其衝會。壽州不守，不可越之而有淮南。唐氏（爲何人不明）曰：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吳不得淮南，而鄧艾理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并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得自保矣。《南齊志》：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揚州所治，北拒淮水。¹⁰³

徵引歷史前例，發爲議論十分平常，中國官員自古即已如此。宋代士大夫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爲發議論，徵引資料的數量和澈底的程度都超越前人。以王應麟爲例，他旁徵博引，幾致無所不包。¹⁰⁴

101 宋·李舜臣，《江東十鑑》（《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82-283；《宋史》，卷 163〈李舜臣列傳〉，頁 12223；《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思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頁 259-260。

102 宋·李道傳，《江東十考》。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308 號光盤），卷 100，頁 842。此文罕見，我無緣得見，其目略見於《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總目》；《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思想》，頁 259-260。

103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學津討原第五集》第 47 冊，上海：涵芬樓，1922），卷 11，頁 15 上下；《南齊書》，卷 14〈州郡志〉，頁 249。

104 除了這裡提到的著作，還有一些其他的，甚至完整的存世，例如：胡寅，《三國六朝攻守要論》；江默，《邊防控陬形勢圖論》；吳曾，《南北征伐編年》；許學士，《南北十論》；趙善譽，《南北攻守類攷》；曾三英，《南北邊籌》。以上這些著作，見於陳愛平，〈南宋對東晉南朝軍事經驗的理論探討與借鑒〉，「書林網」網站，2009.3.11，<http://bbs.ltgx.net/viewthread.php?tid=29210&page=1&authorid=31204>（2009.4.15 上網）；陳愛平，

在壽春，宋、金於淮水兩岸大戰數場。百餘年間，壽春數度易手。¹⁰⁵ 壽春和芍陂扮演了和五六百年前類似的角色。雖然類似，十二世紀時壽春對南方的屏障作用只在當時對抗北方強胡的大戰略敘事中居於一個次要的地位。這頗令人費解，因為南宋是最後一個可以合乎既定的敘事公式的時代——沿淮河，在芍陂的支援下，於壽春設下保衛中華文化的防衛線。

七、壽春的歷史遺產

壽春的戰略地位在實質之外，還被賦予象徵保衛中華文化的重要意義。南宋李燾曾以為江南的東晉乃「禮樂之地，正朔所在」，¹⁰⁶ 換言之即中華文化之所在。圍繞著壽春對抗北胡——不僅限於苻堅——的戰事，發展出一套敘事。這不單單是將一些受歡迎的故事集合起來，也被視為對官員制訂政策具有借鑑的實際作用。¹⁰⁷ 這對南宋官員而言，尤其如此。他們利用南北朝時的壽春為例證，以證明如欲光復北方，保衛淮南地區的必要性。這樣的敘事並不是到宋代為止。

此後的執政者如果沒有從南北朝和肥水之戰汲取到什麼教訓的話，最少還利用它們激發愛國精神。某些當代史家將肥水之戰視為中國史的分水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雷海宗。他說：

肥水之戰是一個決定歷史命運的戰爭。當時胡人如果勝利，此後有否中國實為問題。因為此時漢族在南方的勢力仍未根深蒂固，……蠻族仍有相當的勢力，漢人仍然稀少。胡人若真過江，南方脆弱的漢族勢力實有完全消

〈南宋對六朝南北軍事對峙經驗的理論研究〉，《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3: 29-31。

105 元·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3〈太宗紀〉，頁60、61；卷5〈海陵紀〉，頁115；卷12〈章宗紀四〉，頁274；卷16〈宣宗紀下〉，頁354；卷25〈地理志中〉，頁591；卷60〈交聘表上〉，頁1396；卷77〈宗弼傳〉，頁1752；卷80〈突合速傳〉，頁1800；卷93〈僕散揆傳〉，頁2069；卷122〈忠義列傳二·紇石烈鶴壽〉，頁2668。

106 Michael C. Rogers,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p. 81 note 2；宋·李燾，《六朝通鑑博議》，卷5，頁5下。

107 Alex Callinicos,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8.

滅的危險。南北兩失，漢族將來能否復興，很成問題。¹⁰⁸

雷海宗的論文最初發表於 1936 年，當時中國正在對日抗戰，因此其說自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其說絕不是獨特之見或被認為誇張其詞。其他在中國之內或之外的著作中也都表示了類似的見解。¹⁰⁹ 甚至毛澤東也曾指出，肥水之戰是中國歷史上面對優勢兵力，能先守後攻的六大例證之一。¹¹⁰ 在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肥水之戰具有可供民族主義和意識型態借題發揮的潛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喜歡談論的一個題目。¹¹¹

八、結 論

對現在的壽春人民來說，肥水之戰是當地感到驕傲的資本，而且是一件再明確不過的事件。壽春博物館雖無相關的文物可以展示，但展覽了主要人物如苻堅和謝安的塑像，描述其為一場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在壽春城（據說乃宋代之城）西城門上有一展覽室，其中有一依比例展示八公山戰場的模型。城東北方，在八公山山腳下公園的入口處內，有一大片彩磚所製，描繪晉軍襲擊秦軍而拯救了中華文化的壁畫。

108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五、中國文化的兩周〉，頁 172，184。

109 Michael C. Rogers,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p. 81 note 1 引用范文瀾、傅樂成、呂思勉、Kenneth Chen, J. Dun Li, J. D. Frodsham、市村瓊次郎、岡崎丈夫等人之作。南北朝著名學者王仲榮和李舜臣意見類似，認為肥水之戰邏輯上必曾決定了北胡是否能征服全中國或東晉是否能完成江山一統。東晉未能趁勝追擊，規復北方，是因為建康的統治者僅關懷他們在南方的產業和生存。參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 1 冊，頁 264。

110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載氏著，《毛澤東選集》（西安：人民出版社，1991），第 3 冊，頁 204-242；毛此文寫於 1936 年。

111 關於肥水之戰的文獻太多，這裡難以言其要。一個有用的介紹見市來弘志，〈中国における「淝水之戰論争」について〉，《学習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42(1995): 47-63。



圖四 八公山公園裡的肥水之戰彩磚畫 作者攝
(2009)

壽春屏障南方的主題反覆出現在城的北門。在北門也有類似的展覽，以南唐劉仁贍的故事為主。劉仁贍為對抗後周皇帝哲宗親率的軍隊，堅守壽春三年（955-957），當時其他在壽春周圍的南唐軍隊不是戰敗，就是投降。¹¹²

在較為和平的時代，壽春歷史中其他的敘事主題開始變得重要起來。其中較早出現的一個是，南北朝時，劉安和若干雞犬在八仙陪伴下升仙的故事。在今天的八公山上——離傳說中的劉安墓不遠處——有一座內有劉安彩塑的塔，塔內神仙樂土的邊緣塑有八仙像。劉安在歷史上雖為陰謀叛亂的人，在民間神話裡，他卻取得新生。當地百姓也相信劉安是發明豆腐的人。在今天壽春這樣一個邊遠且尚待開發的地方，這些民間軼聞加上保衛南方的大敘事，共同構成了當地居民足以自豪的記憶。¹¹³

（中譯經邢義田協助潤色）

112 《資治通鑑》，卷 292、293；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29〈劉仁贍〉，頁 1707-1708；Peter Lorge,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27-29.

113 和戰略敘事同樣重要的另一敘事是芍陂是由春秋時名相孫叔敖所建。關於這一點，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將另文詳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賈誼，《新書》，《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5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2。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晉·司馬彪，《後漢志》，收入《後漢書》。
-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梁·慧皎，《高僧傳》，臺北：臺灣印經處，1973。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四庫善本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許嵩，《建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宋·李昉，《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子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3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宋·蘇軾，《東坡全集》，《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7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宋·李燾，《六朝通鑑博議》，《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4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羅泌，《路史》，《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2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學津討原第五集》第 47 冊，上海：涵芬樓，1922。
- 宋·王應麟，《玉海》，《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宋·李舜臣，《江東十鑑》，《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元·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明·陶宗儀，《說郛》，《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明·陳耀文，《天中記》，《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明·章潢，《圖書編》，《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清·張英等，《御定淵鑑類函》，《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206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四部備要》經部，臺北：中華書局，1988，據治城山館本校刊。
- 清·張海等編，《霍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影印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本。
- 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文第 308 號光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清·曾道唯等編，《光緒壽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1，影印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
- 清·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影印觀海堂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二、近人論著

- 王仲榮 2003 《魏晉南北朝史》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鑫義 2000 〈曹魏淮河流域屯田述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5: 105-110。
- 王鑫義 2001 〈魏晉南北朝時期淮河流域的商業和城市〉，《史學月刊》2001.5: 110-115。
- 毛澤東 1991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西安：人民出版社，第3冊，頁204-242。
-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2006 《中國歷代軍事思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日）市來弘志 1995 〈中国における「淝水之戰論争」について〉，《学習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42: 47-63。
- 史念海 1981 《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聯書店。
- 任昭坤 1986 〈三國壽春之戰爲何被冷落〉，《安徽史學通訊》1986.6: 63-64。
- （日）西嶋定生 1966 《中国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李萬生 2003 《南北朝史拾遺》，西安：三秦出版社。
- 周定一、張中和 2000 〈施肥源頭何在〉，收入安徽水利志編輯室、安徽省水利學會水利史志專業委員會編，《江淮古運河考證》，合肥，複印件。
- 周定一、周經寶 2000 〈江淮古運河（肥水古航道）考略〉，收入安徽水利志編輯室、安徽省水利學會水利史志專業委員會編，《江淮古運河考證》，合肥，複印件。
- 金家年 1994 〈論曹魏江淮屯田與水利建設〉，《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4: 84-90。
- （日）服部克彥 1996 《古代中国の都市とその周辺》，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 范文瀾 1965 《中國通史》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修訂本。
- 孫衛國 2004 〈淝水之戰：初唐史家們的虛構？——對邁克爾·羅傑斯用後現代方法解構中國官修正史個案的解構〉，《河北學刊》2004.1: 77-83。
- 高 敏 1996 《魏晉南北朝經濟史》2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馬騏、高韻柏、周克來 2000 〈將軍嶺古「江淮運河」的考察及發現〉，收入安徽水利志編輯室、安徽省水利學會水利史志專業委員會編，《江淮古運河考證》，合肥，複印件。
- （日）宮川尚志 1964 《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京都：平樂寺書店。
- 徐益棠 1948 〈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中國文化研究彙刊》8: 53-64。

- 陳金鳳 2005 《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陳愛平 2006 〈南宋對六朝南北軍事對峙經驗的理論研究〉，《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3: 29-31。
- 陳愛平 2009 〈南宋對東晉南朝軍事經驗的理論探討與借鑒〉，「書林網」網站，2009.3.11，<http://www.booksforest.com/thread-29210-1-1.html>（2009.4.15 上網）。
- 陳夢家 1956 〈編輯後記〉，安徽省博物館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考古學專刊》乙種第5號，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9-21。
- 陳懷荃 1996 〈州來，豫章和壽春城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2: 189-200。
- 《淮河水利簡史》編寫組，水利部治淮委員會 1990 《淮河水利簡史》，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
- 梁方仲 1980 《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許輝、蔣福亞編 1993 《六朝經濟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張承宗 1994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交往〉，《中國史研究》1994.3: 83-92。
- 傅宗文 1988 《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雷海宗 1940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長沙：商務印書館。
- 蔡崇禧 2004 「李燾（1115-1184）《六朝通鑑博議》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http://hub.hku.hk/handle/123456789/31057>。
- 劉淑芬 1992 《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鄭欣 1989 〈曹魏屯田制度研究〉，收入《魏晉南北朝史探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頁63-103。
- 鄭欣 1989 〈論司馬懿〉，收入《魏晉南北朝史探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頁398-416。
- 鞠清遠 1936 〈曹魏屯田〉，《食貨》3.3: 39-45。
- 韓國磐 1959 〈魏晉南北朝時的芍陂屯和石龍屯〉，《安徽史學通訊》11: 55-59。
- Bielenstein, Hans. 1996. "The Six Dynasties, Vol. 1."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8: 6-324.
- Bray, Francesca, and Joseph Needham. 1984.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2,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linicos, Alex. 1995.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John W. 1993. "The Historian as Critic: Li Hsin-ch'uan and the Dilemmas of Statecraft in Southern Sung China." In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ussende, Damien. 2010.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Légitimation du pouvoir impérial en Chine au III^e sièc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 Chi, Ch'ao-ting. [1936] 1963.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Reprint.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 Crowell, William G. 1979. "Government Land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h.D. diss. (unpublishe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Crowell, William G. 1990. "Northern Émigrés and the Problems of Census Registration under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Albert E. Dien,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1-210.
- Crowell, William Gordon. "History and Tradition: The Origins of the Quebei Reservoir." *T'oung Pao*, to be published.
- de Crespigny, Rafe. 1990. *Generals of the South: The Found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Wu*.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no. 16.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de Crespigny, Rafe, trans. & annot. 1996. *To Establish Peace, Vol. 1, 189-200*.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no. 21.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1999.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50-544.
- Fang, Achilles, trans. 1965.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ū Chih T'ung Chien of Ssū-ma Kuang (1019-1086)*. Edited by Glen W. Baxter and Bernard Solomon.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lzman, Donald. 1971. Review of Michael C. Rogers,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 *T'oung Pao* 57: 182-186.
- Hsu, Cho-yun. 1980. *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20)*. Edited by Jack L. Du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Hsu, Cho-yun. 1999.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45-586.

Karlgren, Bernhard, trans. 1950. "The Book of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2: 1-81.

Lewis, Mark Edward.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UNY Press.

Li, Xueqin. 1985. *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 Trans. by K. C. Ch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u, James T. C. 1959.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u, James T. C. 1988.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Liu, Shufen. 2001. "Jiankang and 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edieval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Scott Pearce, Audrey Spiro and Patricia Ebrey, eds.,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35-52.

Loewe, Michael. 1986. "The Founding of the Dynasty." In Michael Loew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ewe, Michael. 2000.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 Xin Periods (221 BC-AD 24)*. Leiden: Brill.

Lorge, Peter. 2005.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London: Routledge.

Needham, Joseph. 1971.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arce, Scott. 2000. "Who, and What, was Hou Jing?" *Early Medieval China* 6: 49-73.

Perry, Elizabeth J. 1980.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gers, Michael C., trans. 1968.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

-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prolegomena.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s, no. 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ba, Yoshinobu. 1976. "Li T'ao." In 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hies*. 2 vol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pp. 585-991.
- Tao, Jing-sheng. 2009. "The Move to the South and the Reign of Kao-tsung." In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decessors, 96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acker, Benjamin E. 1972. "Liu An, Second King of Huai-nan (180?-122 B.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2.1(Jan.-Mar., 1972): 36-51.
- Yang, Lien-sheng. 1961. "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 In Lien-sheng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9-197.

Shouchun: History and Geography

William Gordon Crowell*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houchun 壽春(modern Shouxian 壽縣, Anhui 安徽; aka Shouyang 壽陽) is long and rich. Located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Fei 肥水 and Huai 淮河 rivers and dating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t was the last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Chu 楚. During the Western Han, it was the seat of the kingdom of Huainan 淮南, three of whose four kings rebelled against the Emperor. The last of these was Liu An 劉安, who oversaw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Throughout the Han, economic activity grew, and Shouchun became an important trading center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s the area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grain producing region. As the Eastern Han declined into warlord satrapies and then divided into the Three States, Shouchun becam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During the Three States and the Six Dynasties, it was the site of a number of important battles, the most famous of which was the Battle of the Fei River in 383. This battle was viewed as pivotal in saving Han Chinese culture from being overrun by hordes of the Central Asian and steppe peoples who had conquered the north. Despite the frequent battles, throughout the period Shouchun remained a vibrant center of 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exchang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ts role declined somewhat with unification under the

* William Gordon Crowell was former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He is currently an independent scholar.

Tang, but it resumed much of its earlier role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Moreover, its importance in defending the south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was often referred to in policy debates by Southern Song officials, who pressed the emperor to hold the line against the Jin 金 at the Huai riv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houchun's history—particularly the Fei River Battle—was appealed to by patriots.

Keywords: Shouchun 壽春, Six Dynasties, Huainan 淮南, Huai River 淮河, Battle of the Fei River